

民族文談



民 族 文 談

云南省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室编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责任编辑 王志方 牧延春

封面设计 吴 平

封面题字 殷宗祥

民 族 文 谈

云南省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室编

※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云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印刷所印装

※

787×1092毫米 开本32 印张11.9 280千字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10229·121 定价 1.80元

前 言

《民族文谈》（第一集）与读者见面了！它是民族文学研究的文集，它希望在这个学术领域中汇入自己的滴水之劳。

古往今来，各民族人民在耕耘艰辛、收获可慰的生活实践中，也创造了硕果累累的精神佳品，象神话、史诗、传说故事、童话、笑话、歌谣、谚语……还有近现代的戏曲、诗赋、散文、小说……这里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好比“谷种神话”表现的那样，人们世代代播新种、尝新谷，免不了想要追问：最早的谷种是怎样来的？当今人类蔚为大观的文学艺术，何尝没有自己在蛮荒之中播下的种子。文化创造是川流不息、迄无止境的。如今，我国各族人民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同时，谱写精神文明的新篇章。时代在形成着一些什么新的“调式”，人们在唱着一些什么新旋律，也很值得思索，研究。

古往今来，各民族的文学都依存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实践经验、道德规范、审美意识、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种种因素有机化合，反映在每一种文学形象、故事情节和诗的韵律当中。因此，要透彻地研究民族文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以一般文艺学和美学的规律为主线，广泛吸取哲学、人类学、史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体现当代科学研究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点，自觉进行知识更新，开创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这些也是我们

的愿望和目标。

在这本文集中，有的文章着眼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发展，论述了有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新突破；有的文章立足于编写我国各民族文学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探讨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有的对一定时代的民族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了具体考察；有的从文艺学、美学的角度出发，根据民族文学艺术的丰富材料，在文艺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提出新见解。还有一些文章，对各民族文学资料，进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征和民族特色等多方面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这些文章分别运用了宏观综合、微观分析、比较研究、类型研究等手段，有的文章还引进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的科学方法，作了新的尝试。

本书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1984年的科研成果。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这一工作。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不高，错失和浅昧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一月

目 录

前 言

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崛起的年代……………李绩绪 (1)

开创“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新局面的

一些理论问题……………郑 谦 (11)

论由神话到传说的转变

——与袁珂先生商榷有关中国神话问题……………王 松 (48)

白族龙神话与宗教……………赵 櫓 (68)

从纳西族神话看神话的消亡

——兼谈对“广义神话”的几点看法……………何 密 (106)

神话与文化系统……………郑 凡 (121)

藏族普米族几则神话的比较……………杨照辉 (164)

试论纳西族新文学的崛起……………和钟华 (170)

一颗不该陨落的诗星

——评述刀保乾和他的创作……………岩 林 (194)

民族的歌 时代的歌

——《山茶》创作巡礼……………王志方(203)

绚丽多彩的彝族生活画卷

——试论彝族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左玉堂(215)

傣族先民的理想人物

——论松帕敏的形象……………岩 峰(233)

朗朗笑声传云岭

——谈云南少数民族幽默讽刺故事……………李家璧(242)

《百兽衣》型作品断想……………李志远(247)

人的艺术与神的艺术……………史军超(254)

谈大理石传说的生活美……………段寿桃(282)

神的演变与人的自觉和审美意识的形成……………攸延春(294)

彝族传统文化与彝族渊源……………罗希吾戈(313)

论《格萨尔》史诗原本的作者和整理者……………徐国琼(342)

试谈图书资料工作的

重要性及其建设……………王思宁 饶芸子(357)

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崛起的年代

李 纘 绪

最近几年，我省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进展比较快，成果比较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仅举一些项目和数字为例：1979年至1980年，我们编写了云南二十二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概况；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的学者、专家和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已有四百五十篇之多；这几年，还出版了《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傣族诗歌发展初探》、《论白族神话与密教》、《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白族文学史略》、《民族民间文学散论》、《傣族文学讨论会论文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第一集、第二集等专著和论集。这些学术成果不仅数量喜人，而且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这些学术成果，“尽管其中一些论点还不够成熟，还有探讨的必要，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们的出现，有如清澈的山泉注入止水之中，使平静的湖面顿起波浪，沉寂的湖水忽然发出声响，一切重又充满生机，溶入新的色泽，产生新的力量。”^①这段话是对三中全会以来发表的论文的评价，我想：拿它来评价六年来的全部研究成果，同样也是合适的。可以说，三中全会后的六年，是我省民族民间文学领域拨乱反正的六年，迅速发展的

^①引自《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第二集“序言”。

六年，崛起的六年。

我们说这些年是我省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崛起的年代，那么，这崛起表现在什么地方？或者有哪些标志吗？概括地讲，我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拨乱反正，冲破禁区，开拓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领域。在我们研究领域，早就存在“左”的思想影响，加上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推行了一整套反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给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套上了重重枷锁。不批倒他们那套反动的思想、观点，就无法进行研究工作。三中全会以后，同志们以会议的精神和中央一系列的重要文件作为拨乱反正的强大思想武器，写了一批文章，批判了他们散布的“黑线专政论”、“民族虚无主义”、“阶级调和论”等反动观点和加在我们头上的帽子，廓清了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为研究工作扫清了障碍。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对研究工作的危害很大。表现之一，是用“阶级性”代替了人民性。在阶级社会中产生、传播的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往往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如反映民族起义、农民起义的歌谣和传说，地主与长工的故事，机智人物故事，以及那些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作品，其阶级性是鲜明的。我们知道，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我们研究一切阶级社会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社会中的一切作品、一切文学现象都是带阶级性的，如反映民族风俗习惯、山川名胜的作品，动植物故事，那些反映生产、生活的知识和经验的谚

语、谜语等。那些解放前还处在氏族社会解体期的民族，用“阶级性”这一特征去概括其文学的基本特征，也就不那么全面。史前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则恰恰是无阶级性，而不是阶级性。但过去由于不加区别地使用“阶级性”这一概念，结果，把我们的研究仅仅局限在那些带阶级性的作品上面，而且往往把那些不带阶级性的作品也硬贴上“阶级性”的标签，严重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影响下，在研究工作中，还产生了对列宁“两种文化”学说的生搬硬套的做法，要求不受时间、空间的制约去硬套一切民族、一切社会的民间文学。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是从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当时崩得派企图取消民族文化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而提出来的。他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文化。有普列斯凯维奇、古契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①列宁的这个科学论断，不仅是我们认识现代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观点，也是我们认识一切阶级社会中民族文化的指导线索。但是，不顾时间、空间，要求在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中划分出两种文化及其相互的斗争，显然是很困难的。如前所述，史前的文学艺术以及处于氏族社会解体期的文学，不可能存在两种对立的文学体系。在“现代民族”中划分哪些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文学体系，哪些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学体系，也必须持科学的态度，仔细地加以区分。而且，文学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对每一具体的作家、作品，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文学现象，必须进行历史的、具体的科学分析，方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然而，过

^①引自《列宁全集》第20卷15页。

去对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进行了曲解，把它当成了到处都可套用的教条。结果，把直接由劳动人民创作的作品才当作民族文学，把出身劳动人民的进步的或在文学史上有贡献的作家、作品划入了“反动民族文学”；把同宗教有密切关系的作品统统称之为宗教文学，甚至斥之为“鸦片”；把各民族的“东巴”、“贝玛”、“毕摩”、“朵希薄”等巫师兼歌手的人们，简单地说成是反动文学的代表；把劳动人民创作中的局限和糟粕，没有根据地全归罪于反动文人和宗教的篡改。这就把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引进了一条死胡同。恩格斯说过：“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②恩格斯的这些话，是针对德国的作家和政论家保尔·爱因斯特说的，但拿来总结过去研究工作的教训，也是非常恰当的。

总之，过去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变成了包罗一切的教条，把科学研究变成了任意乱贴标签。三中全会后，我们重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端正了对它的认识 and 态度，冲破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桎梏，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上的民族作家进行了重新评价，为“贝玛”、“东巴”、“毕摩”、“朵希薄”等正了名，重视了对与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有关的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回顾一下这几年来我们所研究的方面和问题，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理论、民间文艺学理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叙事诗、民间戏曲、谚语、谜语、文学交流、民间歌手、艺人等等方面的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的各个门类、作品和重要的文学现象，几乎都在研

^①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178页。

研究对象之列。从时间上看，我们研究的路线，涉及到上下几千年甚至数万年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而且，许多研究者勤于学习和思考，对所研究的课题提出了新问题、新观点。与过去相比，这几年的研究领域不知要开阔了多少倍！

二

深入调查，大胆探索，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

过去，形而上学横行，庸俗社会学猖獗，堵塞了研究的途径。近几年，许多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对于过去的结论，哪怕是经典作家的论断，都敢于思索和分析，敢于实事求是地去研究。

关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六十年代就进行过讨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过分强调了宗教对文学的消极性、反动性，甚至干脆认为，宗教是麻醉、阻碍、摧残民族民间文学的鸦片。从此，这个问题便成了禁区。最近几年，同志们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对宗教问题，马克思曾说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 列宁也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② 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名言，理所当然，应该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原则。但是，不应该用他们的结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页。

②列宁《社会主义与宗教》第8页。

论来代替自己的研究。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于征服了罗马世界帝国并把大部分文明人类支配了一千八百年的一种宗教，并不能只说它是骗子们捏造出来的胡说就算完事。要想知道它产生并达到支配地位的那些历史条件来说明它的发生和发展。”^①对于基督教这个一直被资产阶级用来阻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破坏工人革命运动发展的宗教，恩格斯都强调要研究它产生的条件，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那么对其它宗教也应当抱同样的态度。而且我们知道，原始宗教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些人为宗教是不同的，即使这些人为宗教，在社会发展每一阶段上的作用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许多事实还说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经典中，都保存了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就我省而言，东巴经中保存了许多纳西族古代的民间文学，著名的创世史诗《创世纪》、叙事诗《鲁摆鲁饶》、《游悲》、《黑白争战》，就是其中保存的优秀作品。彝族的创世史诗《查姆》是“贝玛经”中保存下来的作品。“贝玛”的《送魂经》中还生动地反映了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线索。傣族的佛教经典中，除了随着佛教而传进来的那些古印度的民间故事外，还保留了许多傣族古代的文学作品，号称五百五十部的叙事长诗中，有许多就是由佛教经典保存下来的。这就告诉我们，对每一种宗教以及它同文学的关系，必须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和一概肯定的观点，都不利于对问题的探讨。目前，关于宗教和文学的关系的争论尚未结束，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积极地促进了史前文学艺术与原始宗教、神话的起源，以及对“东巴经”、“贝玛经”、“贝叶经”的研究，引起了文学起源的再探讨，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

^①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史》第2页。

关于民谣的评价，过去都是以高尔基的论断为唯一准绳。他认为，“民谣是与悲观主义完全绝缘的”，“假如民谣有时候响着对人间生活的意义的绝望和怀疑的调子——那末这种调子显然是由基督教两千年来的悲观主义宣传和寄生的小资产阶级的愚昧无知的怀疑主义所引起的”。^①然而，随着对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的深入，感到高尔基的这个论断似乎还不那么完善、周密。我们到各民族群众中去采风时，除听到众多的响着欢乐调子的歌谣外，偶尔也会听到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充满抑郁、悲哀的歌谣。它们显然是发自旧时代中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众的心坎。当歌谣的作者们被黑暗势力和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情况下，除了反抗，慷慨高歌，有时也会哼出悲哀的诗句，发出绝望的呻吟。纳西族反映“殉情”的民间作品《游悲》和《鲁摆鲁饶》，都是写青年男女相爱，但遭到社会、家庭和旧习俗的阻挠，走投无路，只好双双去“殉情”。这两部作品，除了描写青年男女到了“玉龙第三国”的情景时，洋溢着欢乐的调子外，作品的其他部分都充满了哀伤的情调。那“玉龙第三国”也不过是一种美丽的主观幻想，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傈僳族的《重逢调》是写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男的出不起聘礼，到异乡去当了十年帮工、奴隶，当男的回到家乡与女的重逢时，女的已被逼嫁，结果，“十年辛苦变成了泡沫，今日相逢听的是葬歌”，那内心的苦楚和悲哀是溢于言表的。白族《鸿雁带书》唱的是离愁别恨，《青姑娘》和《串枝连》反映的是白族妇女的悲惨遭遇。其他民族中那些表现人生的不幸、以死为结局的作品，虽然不能说它们就是悲观主义的，但也不能说它们与悲观主义是绝缘的。其实，民间文学中

①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327至328页。

出现了这样的作品，并不奇怪。民间歌谣直接出自劳动人民之口，其中的喜、怒、哀、乐是由它的作者们的命运决定的。在旧时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极其悲惨的，他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生活在悲剧时代的人们偶尔流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唱出哀伤的调子，是可以理解的。正如《重逢调》唱的：“梧桐叶落是受了严霜与冷风，人心变凉为的是受了欺凌。梧桐果落下是有人采摘，人心变冷是因为生活的折磨。”只有当劳动人民成了国家主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今天，他们才可能摆脱悲剧的命运，也才会在他们的歌谣中结束悲观主义的调子，唱出崭新的充满希望和欢乐的歌。

三

摆脱了用普通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的巢臼，运用民间文艺学的理论以及其它学科的知识 and 研究成果，对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都是用艺术形象反映生活，都属于文学的范畴，它们有共同的特点。但是，民间文学是劳动群众集体的、口头创作的文学，它的产生、流传、变异、发展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是一门与作家文学有显著不同的特殊的文学部门。某些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史前的文学艺术、古神话、史诗、仪式歌、民俗故事等等，好比是一块“共生矿”，可以从中分解出各种原料，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成品。然而，由于过去把以上若干学科打成了“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把民间文艺学混同于一般的文艺学，致使民间文艺学不能正常地、迅速地得到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政策的落实，以上一些学科

又得到了复苏和振兴，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民间文学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虽然这种研究才刚刚起步，尚处在实验阶段，但从研究进展的势头和初步取得的成果来看，前景是令人鼓舞的。比如，这些年，我们的研究者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知识 and 成果，去研究人种神话、开辟神话、洪水神话、图腾神话，就解决了不少研究中的难题，提供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断。云南一些民族中普遍流传着葫芦神话，但为什么这些神话同葫芦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些神话中为什么把巨石、虎、豹、鸡等作为歌颂的对象？过去也未深知其意义。近年来，用有关学科的知识来进行研究，才揭示出：葫芦是多子植物，是母体的象征。对葫芦的崇拜，就是对母体的崇拜。它是母系社会的残留物。对巨石、虎、豹、鸡等动物的特殊感情，来源于图腾崇拜，与民族的族源有密切关系。那些蛇郎型、天鹅型之类的故事，追根溯源，许多都与图腾崇拜密切相关。又如，由于对民俗故事、节日传说、仪式歌等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研究的结果，不仅深化了对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分析，而且发现了它们在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美学上的科学价值。长期以来，由于佛教的大肆宣扬，歪曲了傣族文学的历史，在傣族地区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傣族文学是佛教带来的，是佛祖创造的，近几年来，随着《论傣族诗歌》这一著作的发现，以及对傣族古歌谣、古神话、原始宗教的研究，揭穿了佛教的谎言，把傣族文学史的研究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其内容是单纯的，形式是朴素的，篇幅是短小的，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普通文艺学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而忽视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就会抛弃

了民间文学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我们以上说的，仅是从历史发展的纵方面来看，如果从横断面上去观察，我们的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基础理论的建设上，还是在有关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上，都有不少的薄弱环节，有很大的差距，都需要我们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才能迎头赶上。让我们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五周年国庆为新的起点，加强研究，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工作，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